

社会工作回应性介入精神贫困 ——以上海WT街道边缘家庭的老年人为例

◎于海利

摘要：如何有效地回应性介入边缘家庭老年人的精神贫困是社会工作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课题。揭示服务对象的精神贫困现状，对社会工作的回应性介入具有积极作用。为探索并形成社会工作介入老年人精神扶贫的有效互动模式，在研究视角上，文章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来探索具体的介入路径；在研究方法上，文章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来收集资料并用三级编码的形式对案例进行梳理剖析。文章拟以个人、家庭、社区、贫困亚文化群体作为自变量，来引起精神贫困这一因变量的变化，以形成案主自助能力提升、家庭成员情感支持和亚文化群体良性互助、社区居委动员扶持的有效模式。

关键词：边缘家庭；老年人；精神贫困；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于海利，女，河南新乡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方向：贫困、社会救助、老年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24(2015)12-0054-06 收稿日期：2015年7月24日

社区边缘家庭的老年人以社会的关爱，并提高他们改变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力，从而协助边缘家庭老年人树立对人生的积极态度。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案主进行深度访谈，搜集第一手资料，并依据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对所得的原始访谈资料进行三个级别的逐级编码登录，即开放式登录（指对资料的逐步概念化和范畴化，并把资料以及抽象出来的概念“打破”“揉碎”并重新综合的过程）、关联式登录（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核心式登录（是指在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的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结论和研究者的整体分析框架进行对比）（Strauss et al., 1998）^①。通过三级编码的方式将深度访谈所获得的原始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最终发现案主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

（三）生态系统理论视角

Bronfenbrenner认为，一个发展着的个人不能仅仅被视为被环境所影响的傀儡，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动态的重构环境的实体；而且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最后，环境应该包括四个层面：（1）微观系统（microsystem），包括面对面的群体，也就是家庭、朋友和同事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逐步走向人口老龄化，而且老龄化的速度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老年人问题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尤其是边缘家庭的老年人，他们自身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同时，许多精神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精神贫困问题日渐显现。不能否定，边缘家庭的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也是社会工作最基础的服务对象，本研究旨在通过社会工作的回应性介入来改善他们的精神贫困现状，助力案主老有所乐。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1. 理论意义

首先，对精神贫困及边缘家庭

老年人精神贫困方面的相关研究和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探索社会工作如何运用专业的方法与技巧协助边缘家庭的老年人减轻焦虑，避免贫困和贫困文化渗透至精神层面。其次，依据理论指导，形成一套适用于服务边缘家庭老年人精神贫困的模式和框架，以推进边缘家庭老年人社工服务的专业化和本土化进程。最后，理论的梳理和模式的构建对于后来者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2. 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深入走访和文献研究，发现社区边缘家庭老年人精神贫困的主要表现，并从中找出其可控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第二，项目的开展无疑将给

这样的非正式支持系统；（2）中观系统（mesosystem），包括社区组织和社团这样的正式系统；（3）外围系统（exosystem），包括医院、学校和社工这样的专业支持系统；（4）宏观系统（macrosystem）^②，包括更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如意识形态、信仰系统、风俗和法律，然而案主可能无法使用这样的助人系统，因为此类系统可能不存在，或者与其问题不契合，或者不知道或不希望利用他们。

社会工作实践就是要考虑案主所处的系统，要洞见到系统中的资源和障碍。生态系统视角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人在情境中”这一核心概念，强调以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人和社会。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系统中的，那么边缘家庭的老年人亦不例外，案主的系统大致包括：家庭成员、邻里老伙伴这一微观系统，社区居委会、社区公益社团等中观系统及大的社会环境及社会政策等宏观系统，笔者期望通过推动系统中几个重要影响要素之间的协调互动，包括案主自身、家庭成员、邻里和朋辈群体、社区居委及政府和社会政策，消除边缘家庭老年人的精神贫困。

二、文献回顾

（一）边缘家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社会成员却被排斥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之外，形成了“边缘群体”。罗霞指出，边缘群体的主要特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第二，无法独立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三，边缘化具有积累和传承特征^③。边缘群体的特征也造成其家庭具有相似特征：①贫困性，边缘群体家庭在

经济上面临着共同困境，且可能出现家庭内贫困的代际传递；②脆弱性，在经济上家庭只能维持一种脆弱的生存和简单的再生产，在心理上边缘群体具有高敏感性、封闭性和相对剥夺感；③边缘化，边缘人群由于经济的贫困几乎没有可利用的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参与到广泛的社会交换中，以换取自我发展的资源和机会；④低层次性，边缘人群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低下，一般都居于社会的下层^④。本研究所指的边缘家庭是在经济、文化和生理上被排斥于主流群体外的家庭，普遍具有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健康状况不佳、缺乏社会认同和社会支持等特征。

（二）关于精神贫困

在目前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精神贫困的具体定义尚未有统一的共识，但是大致可归为余德华提出的绝对精神贫困和相对精神贫困两类。

1. 绝对的精神贫困

余德华曾经指出精神贫困是物质贫困的直接后果和人文表现，精神贫困是由经济、教育、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社会发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物质的因素带有根本性，物质贫困从整体上决定精神贫困，而精神贫困又是物质贫困产生的主要根源。因此，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精神脱贫入手，走精神脱贫之路^⑤。针对什么是绝对精神贫困，余德华认为绝对精神贫困是指受教育时限短、文化知识占有量严重匮乏、价值观念陈旧、思维方式单一、生存能力低下、发展能力严重缺失、生活方式单调；而韦国善认为“精神贫困”是指人由于经济贫困而呈现出来的观念倾斜、精神扭曲，而使其思想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精神现象，其主要表现为思想上、心理上的扭

曲^⑥。王容和申丽娟（2009）探讨了精神贫困的内涵。认为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是指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困扰和压力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障碍或精神空虚等现象，或者是没有理想、胸无大志、自卑，没有积极向上和豁达的生活态度，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遇事敏感且束手无策等^⑦。从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绝对精神贫困是指由于物质贫困所导致的精神层面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另余德华指出在精神贫困的形成中，文化的“惯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2. 相对的精神贫困

余德华认为相对精神贫困是指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精神文化水平未出现相应的跟进或提升，教育、观念、素质、能力等的提高落后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精神文化对社会有机体的作用相对有限和价值导向与社会发展方向发生偏差^⑧。朱华晔也从相对性出发，强调精神贫困是某群体或个人的精神生活需求或认同程度显著低于群体中其他多数个人的需求和认同程度^⑨。人民日报刊载文章称“精神贫困”则是对理想信念淡化、内心世界空虚、工作不思进取、生活情趣不高等现象的一种比喻^⑩。李强认为精神贫困是指“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因种种因素在思想道德素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落后于社会主流精神风貌的一种精神状态^⑪。”简单来说，相对精神贫困是指精神层面的进步落后于物质方面的发展。

学者郭荣丽指出，与物质贫困相比，精神贫困最明显的特征是非量化性，因此，精神贫困难以运用贫困线、贫困发生率等指标来确定、衡量。此外，精神贫困的治理具有长期性。物质贫困通过政策倾

斜、财政支持等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但精神贫困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且效果亦可能不明显^⑧。

根据以上梳理，不难看出，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大多采用的是相对精神贫困的定义，而对于绝对精神贫困的研究较少。本文所提到的精神贫困是指绝对的精神贫困，也就是由于物质贫困所导致的精神贫困。

(三) 边缘家庭老年人的精神贫困

在已有的研究中，有关精神贫困的研究主体大多数是贫困大学生，即便是较为少数的学者所关注的老年人精神贫困，也大多是探讨并呈现其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基本上没有涉及社会工作该如何介入这一领域的论题，而针对边缘家庭老年人的关注点大多是物质资助、社会救助，鲜有学者探讨如何专业性介入。郭荣丽指出老年人口精神贫困特指老年人口的思想落后、信仰缺失、情感孤寂等心理状态，在此种状态下，老年人口普遍表现出情感、社会交往等需求不足^⑨。但是这也只是针对老年人的精神贫困，根据上述对边缘家庭的界定，在对精神贫困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边缘家庭老年人的精神贫困有其特殊性。

三、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案例分析

(一) 案例来源

鉴于笔者曾在上海WT街道做过服务项目，基于自身对于社区具体情况的了解程度，笔者将案主界定在外滩街道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是繁华的大上海的“贫民窟”，住房拥挤、破旧，基础设施滞后。社区居民大多呈现出老龄化、贫困、大重病、失业、单亲等情况，这个

社区中“垮掉”的是中间的一代，这些状况使他们逐渐“边缘化”，成为了繁华地带被遗忘的角落。虽然诸多项目进驻社区，但大多数是针对儿童青少年学业及成年人就业的项目，老年人再一次成为了边缘家庭中被忽视的个体。将个人精神状况、社区活动参与情况等作为指标对社区边缘家庭的老年人进行筛选，经过社区个案管理员的推荐以及笔者对社区老年人状况的把握，最终选择了W阿婆作为案主。W阿婆可能无法代表所有边缘家庭的老年人，但在这个社区里，W阿婆的状况却不在少数：老年人、经济贫困、精神状态较差、社区活动参与度弱、家庭成员之间情感支持较少等。因此，W阿婆较能够代表这一社区中边缘家庭的老年人，也就是说案例选择较具代表性。

(二) 案例背景

W阿婆，女，78岁，本地人，患有脑梗，老伴很早去世，每月退休工资2400元，要支付自己的医药费。她的儿子56岁，患有再生性贫血，不到三十岁就不工作了，单位给办了停薪留职，每月给予1000元补贴。阿婆儿子四十多岁时才成家，和妻子认识半个多月就结婚了。后来媳妇经常在家里吵闹，完全不管孩子，阿婆儿子只好在附近租了一个房子给媳妇单独住，每月租金700元，儿媳平时打零工，基本不挣钱。孙子6岁，上幼儿园大班，平时跟自己和儿子住在一起。

(三) 案例剖析

根据案例背景以及所获得的访谈资料，依据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式对案例进行梳理和分析。

1. 开放式登录

原始资料	概念化	范畴化
我自己患有脑梗，平时需要吃很多药 (a1) 现在我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有时候也能照顾照顾孩子 (b2) 我最担心孙子的学习，也担心儿子和儿媳的婚姻生活，还有将来我死了，没有退休金了，他们怎么生活…… (a3) 我除了那点儿退休金，哪里还有什么经济能力呀 (a4) 平常和他们没啥可交流的，他们说的有的我也不懂，有饭吃就可以啦 (a5)	患病 (a1) 生活自理能力 (a2) 心理焦虑 (a3) 经济能力 (a4) 和其他家人的交流 (a5)	案主自身基本状况 (A)
儿子从三十几岁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工作，每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 (b1) 儿媳现在是在做零工，也挣不来什么钱 (b2) 四十多岁成家，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b3) 现在只是在家里照顾自己和孩子 (b4) 儿媳现在在外边租房住，每个月700块，具体生活怎么样不太清楚 (b5)	儿子的工作情况 (b1) 儿媳的工作情况 (b2) 儿子的婚姻 (b3) 儿子的生活 (b4) 儿媳的生活 (b5)	儿子儿媳的基本情况 (B)
孙子现在是和我一起睡的，慢慢长大不方便；孙子上学也要早起而且坐很久的公交车 (c1)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孙子的学习了，他现在大了，看电视会问很多东西，可是我和他爸爸都回答不了，也不知道他学习怎么样 (c2) 你看看我孙子吃的饭 (包括半碗米饭粥、昨晚只剩碗底的番茄炒鸡蛋、还有一点儿榨菜)，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对不起这个孩子的 (c3)	孙子的生活 (c1) 孙子的学习 (c2) 孙子的营养状况 (c3)	孙子的生存现状 (C)
我们家的房子是老房子啦，你看看，地面都是斜的，放个球就能自己跑那边去，大小也就30平方吧 (d1) 我们俩关系一点儿都不好，她是外地媳妇儿，而且总是闹，为了上海户口又不和我儿子离婚 (d2)	住房 (d1) 婆媳关系 (d2)	家庭环境状况 (D)
我的邻居就是隔壁这一家，平时也没什么很多的往来，我也不是很乐意跟他们多接触 (e1) 我平时都不怎么出去，也没有固定的差不多大的老伴儿 (e2)	与邻居关系 (e1) 年龄相仿的老伙伴 (e2)	朋辈群体和邻里的支持情况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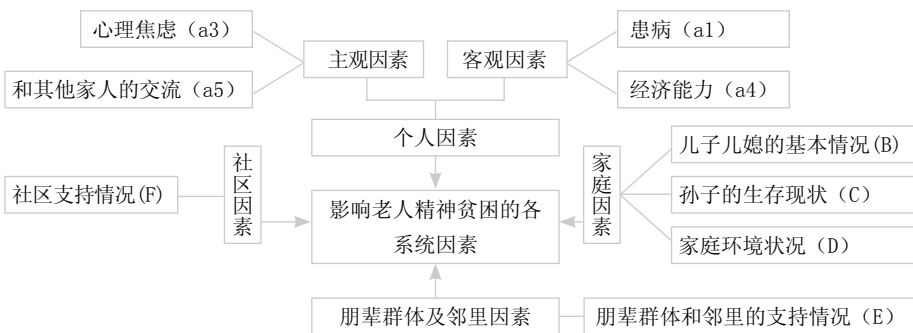
(续表)

原始资料	概念化	范畴化
我们这个居委都是很老的地方了，房子都是老房子比较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场所（f1） （居委会资料）社区里面大部分都是单亲、吸毒、犯罪等家庭，都属于边缘群体，相对比较贫困，平时也都是各顾各的社区氛围（f2） （观察）进入社区就能看到私拉乱扯的线绳、泥泞的弄堂、黑暗潮湿的阁楼（f3）	社区基本设施情况（f1） 社区氛围（f2） 社区概况（f3）	社区支持情况（F）

2. 关联式登录

各系统要素		范畴化
心理焦虑（a3） 和其他家人的交流（a5）	主观因素	个人因素
患病（a1） 经济能力（a4）	客观因素	
儿子儿媳的基本情况（B） 孙子的生存现状（C） 家庭环境状况（D）		家庭因素
朋辈群体和邻里的支持情况（E） 社区支持情况（F）		朋辈群体 社区因素

3. 核心式登录



四、案例中边缘家庭老年人精神贫困的表现

根据上述三级登录编码所显示的结果，我们可以将案主的相关精神贫困的表现大致总结如下：

（一）精神长期焦虑，心事重重

现代长寿理论明确指出：在对人的一切不利影响中，最使人短命的就是不良的情绪和恶劣的心境。从三级编码显示出来的材料来看，案主王阿婆长期处于精神焦虑之中，她焦虑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资，因为家里除了她每个月2400元的退休工资和儿子每月1000元的补贴，再加上低保，没有别的收入，阿婆自己生病吃药、平日里日常消费、孙子上学教育费用及儿媳的房租都要用这些钱，对阿婆家庭来说经济

无疑是紧张的，物资是缺乏的；焦虑孙子的学习教育，由于阿婆自己、儿子和儿媳都没什么文化，没有办法对孩子的学习予以指导，家里又没有多余的钱拿来给孙子报辅导班或者请家教；焦虑儿子的婚姻和生活，儿子和儿媳一直吵闹，由于儿媳想要上海户口，所以拖着不离婚，但是他们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处于分居状态；而且，平日里其与儿子和孙子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没有什么交流，无法融入到子女的谈话之中，这样更加加剧了她的焦虑和落寞。

（二）“笼养”状态导致的神情漠然

从三级编码整理出来的信息来看，由于性格和身体等原因，案主不是很愿外出活动，即便是和一

墙之隔的邻里互动。当然，和社区其他朋辈群体的联系亦较少，生活基本处于“笼养”状态，鲜少与外界接触，自我封闭，导致案主自我存在感和价值感缺失以及社会交往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笔者探访时发现案主在述说时会出现发呆、反应慢等情况，而且这个时候脸上大多神情漠然，这显然与案主经常处于“笼养”状态有关，与外界陌生人的正常交流已存在困难。

（三）安于现状，消极面对生活

由于身体状况等原因，边缘家庭老年人大多处于“笼养”状态，无法接触到外边的新鲜事物，已然与社会脱节，整天麻木于起床、做饭、吃饭、吃药和睡觉等“规律性”的生活，安于现状，对待生活也是过一天少一天的消极态度。而且在他们的眼中，这样的生活是很正常的，因为社区中其他的老年人也都这样，这显然与社区内贫困亚文化的传递有关，而且贫困亚文化很可能是居民缺乏积极性与进取心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最可怕的不是物质贫困，而是精神贫困及精神贫困的传递，而且这种贫困的传递不仅存在于同辈群体中，还会出现现代际传递，所以这种安于现状、消极面对生活的状态的改变刻不容缓，尤其不能传至第三代。

（四）习惯性的福利依赖

依据笔者对于社区状况的了解，案主等类似的社区边缘家庭老年人都习惯性地“等、靠、要”。退休金或其他补贴再加上低保，可以保证他们最低水平的日常生活，案主也就不会说服儿子去接受社区介绍的位置偏远、工资偏低的工作，就等每个月送上门的低保，而且无论谁来探访都会习惯性地表达贫困，可怕的是这种表达已然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在我考虑敏感词

汇要委婉讲的时候，案主自己却毫无顾忌地讲自己贫困、儿子和儿媳吵架等。除此之外，社区不管举办什么活动，只要有物资就一定去参加，哪怕只是为了去拿一些奖励和补贴。

五、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具体实务介入

在系统理论视角下我们分析了案主系统，但在具体的实务介入时，笔者主要针对案主系统中几个重要要素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案主自身、家庭成员、邻里和朋辈群体、社区居委及政府和社会政策。

（一）协助案主培养个人兴趣，促使案主自助能力提升

首先，社工根据已经了解的信息对案主进行入户探访，提供一些心理咨询和情绪疏导等服务，亦可以引导老人回顾以前的事情、探讨家庭目前的状况，以激发案主说话的欲望，从而促使案主打开心扉。此外，其实有时候所有事情都帮老人代办反而会让老人感觉自己没有存在感和价值感，所以社工可以从“单一满足需求”到“兼顾激发潜能”，协助老年人在空余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寻找与自己兴趣相投的娱乐活动。如种花种草、养鱼养鸟、绘画书法、歌舞旅游、拳剑功操、读书看报等，这些活动能使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态与精力，增强体力，同时也可以助力他们找到精神寄托，使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二）家庭成员主动承担，助力案主消除焦虑

赡养既是家庭功能的体现，也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奉献了一辈子的老年人理所应当得到子女们的赡养和照顾，但是赡养不仅包括物质赡养还包括精神赡养，案例中的儿子和儿媳不仅没有承担起家

里赚钱的责任，还要用老人的退休金补贴自己，且儿子和儿媳还经常吵架。在这种情况下，社工就需要动员儿子、儿媳这两位成年的家庭成员主动承担责任，减轻老人对物质需求的焦虑，使案主保持身心愉快，这也是精神赡养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还要重视老人的心理情感，尊重老人的志向和意愿，为老人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以促进老人真正老有所乐。除此之外，通过动员家庭成员，使他们对生活、对家人负责任，他们的自我价值逐渐实现，物质生活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改善，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的福利依赖。

（三）开展老年人支持小组，促进亚文化群体良性互助

在社区个案员入户探访时进行宣传倡导，鼓励边缘家庭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年人结成老伙伴，倡导他们结成互助支持小组，尤其是相邻的邻居，平日里生活上既可以相互照顾，也可以相互倾诉，给对方以情感支持。这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被需要感和存在感，因为有时候来自邻里和朋辈群体的非正式支持反而能起到良好的互助效果，同时也会弥补家庭等正式支持的缺乏，有利于形成亚文化群体良性互助的良好精神文化氛围。

（四）社区提供贴心入户服务，举办活动动员案主走出“笼养”

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主要在于社区功能的发挥。随着城市生活方式和居住结构的改变，家庭精神赡养越来越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社区精神赡养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开始建设“亲情社区”，使老人有机会和场所进行交流沟通和休闲娱乐，帮助老人消除烦恼，开阔心胸。在社区中，老年人可以在各种活动中不断调适

自身的角色，重新认识与接受自己，同时也获得了为他人、为社区服务的机会，在取得自我实现的同时，“老有所为”的目标也得以实现。社区需要针对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心理和生理等方面的需求，不断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以鼓励老人走出“笼养”状态，不卑不亢地与社会接触，并充实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由于案主所在社区有一部分是独居老人，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社区专门设置个案管理员，定时到户提供敲门服务等，以便随时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并弹性介入以提供帮助，让案主感受到来自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五）政府关注重视精神贫困，政策倾斜保障老有所乐

政府可以倡导社会大众关注边缘群体家庭的老年人，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重视他们存在的精神贫困现象，并探索途径避免精神贫困的大面积出现；在财政方面进行倾斜，通过支持并购买关爱精神贫困老年人的项目，更好更合理地减少以至消灭精神贫困，构建尊老爱老的零歧视和谐社会环境；在政策层面，政府可以制定更切合边缘家庭老年人所需的社会救助政策和养老保障政策等，更多地出台一些“授人以渔”的政策，保证老人享受优惠政策的同时，亦能够激发自身活力和潜能。

文章注释：

①左冬梅，宋璐. 城市社区老年人对养老院态度影响因素的概念框架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 西北人口, 2011(1).

②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③罗霞. 城市边缘人: 被社会忽视了的人群[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115-119.

(下转第44页)

作认识, 加强对其社工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化培训, 提升社工咨询的专业化水平; 聘请社工咨询和实务领域的专家、专业人才为兼职工作者, 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高校社工人才培养适当增加社会工作咨询的相关理论课程和实践训练, 提供一定咨询方面的选修课程; 提高IT技能, 将个人、组织和环境要素有效的整合, 实现社工咨询知识和能力的生产、储存、检索和转换。

“万众创新, 大众创业”的时

代背景, 为社会工作咨询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社会转型, 管理创新的发展格局, 为社会工作咨询提供了良好的介入条件。社会工作咨询作为一种间接服务方法, 需要抓住时机, 在服务社群中增强认同, 在绩效压力下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 张利增, 丁兆叶. 社会工作的心理学基础[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8(5):61-67.

[2] 范明林, 徐迎春. 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J]. 社会, 2007(2):119-133.

[3] 李家鹏. 社会组织的咨询式培育方法探索[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2:34-35.

[4] 董云芳.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发展初期的困境与突破[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5] 黄耀明. 略论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的关系[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9-12.

上接第58页

④王瑾. 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J]. 社会主义研究, 2008(1):119.

⑤余德华. 论精神贫困[J]. 哲学研究, 2002(12).

⑥陈序培, 徐莉. 对精神贫困大学生的分析与对策[J]. 宜春学院学报, 2007(12):184.

⑦朱华晔. 精神贫困: 定义、分类与测度[J]. 统计与咨询, 2011(4):54-55.

⑧同⑤.

⑨朱华晔. 论“精神贫困”的定义与内涵[J].

内江科技, 2011(12):28.

⑩胡线勤, 赵元方. 警惕“精神贫困”[N]. 人民日报, 2002-08-27.

⑪李强. 大学生“精神贫困”现象分析及解决策略[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6(5).

⑫郭荣丽. 基于精神贫困的中国老年人口社会救助研究[J]. China's foreign Trade, 2012(10).

⑬同上.

参考文献:

[1] 劳伦斯·马奇. 怎样做文献综述——六步走向成功[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2] 赵尉, 沈岸. 浅谈中国老年人口的精神赡养[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2010(6).

[3] 韩宇明, 魏铭言. 我国仅2成多老人主要靠养老金生活[N]. 新京报, 2012-10-22.